

周士第四回忆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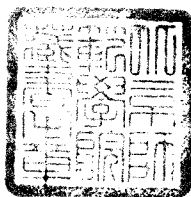
L251/22

周士第回忆录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13581



人民出版社

713581

周士第回忆录

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6.375印张 153,000字

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50,000

书号 11001·374 定价 0.49元

目 录

在党领导下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——铁甲车队	1
北伐先锋	38
关于蒋介石制造三月二十日反革命事变的一些情况	118
起义中的二十五师	140
东征回忆	151
把敌人挤出去	166
甄家庄歼灭战	172
晋中平原上的一个歼灭战	180
回忆贺龙同志	191
编 后	202

在党领导下最早的一支革命 武装——铁甲车队

铁甲车队是由我党领导的、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的一支革命武装。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，这支革命武装为支援广东农民运动、支援省港大罢工、平定军阀叛乱，为保卫新生的广东革命政权，进行了英勇的战斗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这都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，回想当年那如火如荼的斗争，至今在我脑子里仍留有清晰的记忆。

一、铁甲车队的建立

一九二四年的国共合作，迎来了革命形势的高涨，广东当时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。一九二四年五月，实行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工农”三大政策的孙中山先生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，开办了黄埔军校。当时，党对革命武装问题，认识虽还不深刻，但对组织自己的革命武装，则已开始有所要求。铁甲车队便是在此情况下，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成立的。它的番号全称是“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”。

事前，中共两广区委与孙中山先生商量，说要建立一支革命队伍，孙中山先生同意了。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同志便着手进行筹备工作。这时正值黄埔军校第一期快毕业了，周恩来同志便从黄埔军校中调了徐成章、赵自选及周士第三人，另从外面调了廖乾

五、曹汝谦二人，一共五人，负责进行具体组织工作。还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、农民、青年充当队员。在铁甲车队的成员中，还有少数来自大元帅府的卫士队。

党当时还有一个打算，即通过铁甲车队的建立，除了自己可以直接掌握一支武装外，还可以培养训练我们的干部，日后派去各地开展革命工作。因此在队员当中，有不少来自广州、海南岛、东江以至南洋的，后来也有不少人经过训练培养后，调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和海南等地工作。例如队员符福明，从南洋回来，后派去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当小队长。

因此说铁甲车队名义上是大元帅府下面的铁甲车队，但实际上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队伍。铁甲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与调动，都是中共两广区委决定的；铁甲车队的工作与活动等问题，也是直接请示区委陈延年和周恩来等同志解决的。

还有一点要指出的：当时大元帅府尚有一支卫士队（队长卢振柳），有些资料也称之为铁甲车大队。但该队与我们铁甲车队完全是两回事，互相间没有任何关系。

1、编制与组织成员情况

铁甲车队的编制，队部设队长、党代表、副队长、政治教官、军事教官、军医、差遣、司书、军需上士各一人，通讯员、号兵、勤务兵各两人，卫生员一人，炊事班有正副班长各一人，炊事员十人；队有三个排，每排有正副排长各一人，每排有三个班，每班有班长、副班长各一人，队员十人，总共编制一百三十六人。另外，中共两广区委经常临时派一些人来受训，全队人数经常有一百五十人左右。

铁甲车队成员中，现在记忆起来的，有：

队长：徐成章，党员，海南岛人，黄埔军校第一期特别官佐。省港罢工爆发后，调任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党派他返海南从事武装斗争，曾任琼崖工农红

军东路总指挥，后在万宁县分界市战斗中牺牲。

党代表：廖乾五，党员，陕西人。铁甲车队合并成为叶挺独立团后，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。

副队长：周士第，党员，海南岛人。徐成章调走后，任队长。

军事教官：赵自选，党员，湖南浏阳人，黄埔一期毕业。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帮助开展广宁农民运动，一九二五年二月回广州后，调飞机掩护队，任党代表；后调农民运动讲习所当军事总队长兼总教官。大革命失败后，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，后牺牲。

政治教官：曹汝谦，党员，山西应县人。据说以后党调他到北方搞兵运工作，后牺牲。

差遣：张尚武。

司书：周廷恩，海南岛人。原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届学员，后调铁甲车队。在铁甲车队入党。独立团成立时，当一营书记，七十三团军需主任。南昌起义后，当二十五师军需主任。一九二七年党调他回海南岛工作，在海口被捕牺牲。

军需上士：徐麟章。

一排长：莫奇标，广东郁南人，是从卫士队调来的，在铁甲车队入党。北伐时任独立团一连连长。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攻打武昌时牺牲。

二排长：李海涛，湖南人。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后留在法国。一九二四年回国。铁甲车队成立时，党派他到铁甲车队任班长，后升为排长。在铁甲车队入党。独立团成立后，任独立团八连连长。北伐攻打武昌时牺牲。

三排长：高超，武昌人，是卫士队调来的，在铁甲车队入党。后任独立团三连连长。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攻打武昌时牺牲。

还有一个排长：李振森，湖南湘乡人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沙鱼涌战斗中牺牲。

副排长：邱炳坤、黄祝三。

班长：黄华然，广东海丰人，原在广州工团军工作，后调铁甲车队受训，任班长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沙鱼涌战斗中牺牲。

班长：万献廷，湖北人，后在独立团当排长。

班长：张宏远。

班长：曾强，广东惠州人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沙鱼涌战斗中牺牲。

队员：祝敬事，江西铅山县人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沙鱼涌战斗中牺牲。

队员：陈功安，文昌人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沙鱼涌战斗中牺牲。

队员：周朝奎，广东乐会人。曾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当过纠察队小队长。一九二七年冬党派去海南岛工作，在海口被捕牺牲。

队员：宋烈光，文昌人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沙鱼涌战斗中牺牲。

队员：易再盛，江西人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沙鱼涌战斗中牺牲。

队员：王子章，四川人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沙鱼涌战斗中牺牲。

队员：郑良溶，江苏人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沙鱼涌战斗中牺牲。

队员：黄生，海丰县人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沙鱼涌战斗中牺牲。

队员：刘光烈，湖南常宁人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沙鱼涌战斗中牺牲。

队员：高博垣，广宁人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沙鱼涌战斗中牺牲。

队员：唐达权，钦州人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沙鱼涌战斗中牺牲。

队员：李镇华。

队员：翁世簪，海南岛人，好象是从南洋回来受训的。

队员：符抗雄，海南岛人。

队员：陈德传，海南岛人。

队员：马维楚，后在独立团六连当司务长。

队员：戈尚治，党员，后在独立团当班长，七十三团当排长，参加南昌起义，在三河坝笔枝山战斗中牺牲。

队员：符福明，文昌人，从南洋回来，调铁甲车队受训，后派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当小队长。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病逝。

队员：周子昆，广西人，不久调任班长。后任独立团、二十五师排、连、营长。参加南昌起义，起义军潮汕失败后，上了井冈山，任红军师长。抗战时任新四军参谋长，皖南事变时牺牲。

队员：江标远，广东潮州人。独立团成立后，任班、排长。北伐攻打武昌时牺牲。

号兵：罗少海。

勤务兵：蔡文铎，共青团员，广东中山人，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攻打武昌时牺牲。

铁甲车队驻在广州大沙头一幢四层楼高的洋房，外面挂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大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部”。

铁甲车队的装备，共有几辆铁甲车，及一部分其他车辆，驰骋于广东省内各条铁路上。班长、队员一律配备“三八”式长枪，排以上干部配备驳壳枪。长枪和驳壳枪都是苏联帮助的。每排还有一支手提机关枪。

2、党的组织

铁甲车队成立一个党小组，最初有党员五人，即廖乾五、徐成章、周士第、赵自选及曹汝谦。帮助广宁农民运动和讨伐杨刘后，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，其中有莫奇标、高超、李海涛及周廷恩等人。中共两广区委调来训练的队员中，可能还有一些是党团员，但名字记不清楚了。党小组长为廖乾五。党小组生活会每周一次，每次除了讨论工作外，都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。铁甲车队始终都设党小组，没有改为支部。铁甲车队的党组织关系直接属中共两广区委领导。一切事情，请示报告以至于干部调动和配备等，都是直接向区委陈延年、周恩来等同志请示作出决定的。

我们有时也找苏联顾问团的沙非爱夫同志商量铁甲车队的工作问题。

3、部队训练和生活

铁甲车队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，便非常重视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工作。

在政治训练方面，由政治教官曹汝谦同志负主要责任。每天上政治课二小时；晚上组织小组讨论。政治课讲授三民主义、社会发展史、工农运动情况、目前国内外形势等等。曹汝谦同志负责讲授三民主义课，他着重讲述民生主义部分，特别联系到讲解阶级斗争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。曹汝谦同志还负责讲社会发展史。廖乾五、徐成章、周士第、赵自选四人亦分别担任讲课。主要是解释国内外革命斗争形势，分析帝国主义、国内军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，资本家、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工人农民的事实，以及解决当时队内发生的问题，亦经常请外面的人来作报告。例如彭湃同志便曾到铁甲车队作过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报告。

军事训练方面，也非常紧张地进行，主要内容是射击、投弹、刺杀、利用地形地物、单个动作、夜间动作以及班、排、连演习等。

政治军事训练除了一般地进行外，还特别注意因人施教，根据

不同对象、不同程度进行具体帮助。例如对一些新战士或从各地派来训练的，除了一般训练外，还专门进行帮助和训练。特别是对后者，考虑到他们日后将要回到各地从事革命工作，因此着重对他们进行具体的耐心的帮助，以迅速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、工作能力，帮助他们掌握军事常识。

上述训练工作，即使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，如帮助开展广宁农运及前往深圳、沙头角等地封锁香港期间，也利用时间进行政治军事训练。

这里值得着重提及的是，彭湃同志本人非常重视和亲自参加军事训练活动。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五年二月，他在广宁与铁甲车队一道工作期间，经常请徐成章、周士第及赵自选等同志讲授军事，他自己还经常练习实弹射击。在铁甲车队驻地社岗通向潭埗的路上有一棵树，彭湃同志经常用他的驳壳枪向树上的一个“疙瘩”练习实弹射击，那棵树身上最少挨了几十发子弹。

对队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也是很紧的。廖乾五、徐成章等同志经常找队员进行个别谈话，对一些思想有问题或犯了错误的队员，进行耐心的启发与教育工作。因此，大家工作非常忙碌紧张，经常工作至深夜还不休息。但第二天一清早，仍然与队员一道，进行各种训练活动。

铁甲车队的的生活，虽然是非常紧张的，但同时又是活泼的。队员们经常练习唱歌，最常唱的是《国际歌》、《少年先锋队歌》、《国民革命歌》以及《工农兵联合歌》等。有时开晚会，队长、队员还凑在一起，表演唱歌、双簧，一起演戏。

铁甲车队的伙食费、办公费与杂支费开支账目每月都定期公布一次。队里对贪污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。队长、党代表和队员的伙食标准一样，都是五元至六元左右。大家吃一样的伙食，每月伙食有节余时，大家一齐分，官兵都一样，叫做分“伙食尾”。有

一次苏联顾问团的沙非爱夫到深圳看望铁甲车队。开饭时，他与大家一道吃饭，一点青菜，一点咸鱼，我们也没有特别做菜来招待他，他当天的伙食费由队里的杂支费开支，月底公布账目时，也列明清楚。

所有这些，都与其他军队完全不一样，这是一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新型的革命武装。

因此，铁甲车队的战士们，有一定的阶级觉悟，有严格的纪律，坚决执行中共两广区委的指示，坚决捍卫工农群众的利益，通过下面一个例子便可见一斑：

有一个名叫符福明的队员，家里很穷，原是一个从南洋回到铁甲车队受训的工人。他经过了一个时期的训练后，“思想日益进步，革命精神更加焕发”。后来他病重，送入院医治，还经常念念不忘地对其他战友说：“我深知工人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，力量非常伟大，实为国民革命的根本势力。所以我们军人保护工人，就是拥护革命。”“我们须有武装直接与帝国主义军阀决一死战，才为痛快！”他并且说：“死不足悲，不做革命而死斯悲耳！”（见《工人之路》第140期第四版）。可见符福明是一个具有阶级觉悟的队员，象符福明这样又岂止一人。

二、帮助开展广宁农民运动

1. 第一次打仗和做群众工作

一九二四年初，在共产党员周其鉴等同志领导下，广宁农民运动开始发展起来；不久，成立了农民协会，但是很快就给反动地主豪绅镇压下去了。下半年以后，农民运动再次发展起来，并且提出了恢复农会、减租等要求，凶狠的反动地主，自然不甘心接受农民这些正义要求，因而实行更为疯狂的反抗，组织反动武装攻打农

会，屠杀农民。

为了更好地领导与帮助广宁农民运动，中共两广区委先已派了彭湃同志下去；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上旬，又决定派铁甲车队到广宁，镇压反动地主，帮助农民运动。

事前，中共两广区委把廖乾五同志叫了去，向他作了上述的指示。区委初时意见是派廖乾五、徐成章和周士第三人带领两个排下去，赵自选、曹汝谦两人留下，继续对留在广州的部队进行训练工作；叫廖乾五同志回去与大家讨论一下。廖乾五同志回来后，召开了党小组会，传达了中共两广区委的指示，大家听了都非常兴奋。赵自选、曹汝谦两同志也要求到广宁帮助农民阶级兄弟，最后党小组讨论结果，同意赵自选同志也下去，而把曹汝谦同志留下，认为留在广州的部队的训练工作非常紧张，需要留下一位同志来掌握。

我们将这个意见向中共两广区委报告，经同意后，立刻带领队伍兼程出发，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赶到广宁，驻在社岗地方。

铁甲车队的到来，给予农民群众很大鼓舞。他们奔走相告，成群结队，跑到数十里路以外去欢迎铁甲车队。

第二天清早，六、七十名农民自卫军出击敌人，在潭埗附近地方与反动地主武装发生战斗，铁甲车队随即赶来增援，声势大振，敌人抵挡不住，纷纷退入江家大炮楼负隅抵抗。是役共击毙敌人数名，缴获枪支数支。我方也被打伤三名铁甲车队队员及一名农民自卫军。

潭埗有两个大炮楼。一个是江家反动地主的，一个是黄家反动地主的，江家反动地主的炮楼规模很大，花了数十万银元才建成。炮楼有五层楼高，非常坚固，平日江家地主们在炮楼里储备了大量粮食武器等。一有事情发生，不少地主纷纷搬进炮楼，负隅据

守，炮楼可容几百人。

因此，光凭我们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器一时是攻不下炮楼的。我们乃决定撤围，暂时不攻打炮楼。这期间，我们加紧帮助训练农民自卫军，以及派出队员到附近各乡进行群众工作。

2. 争取第三师驻广宁部队站到中立地位

在我们到了广宁社岗几天以后，国民党右派第三师师长郑润琦也派了两个连，在副官长詹学新率领下到来“驻防”（广宁是第三师的防地），名为“保护地方治安”。他们到来后，径直住在潭埗。潭埗的大地主江汉英等人立即宰猪杀牛，大排筵席，“慰劳”第三师，每日还发给每名士兵饷银若干。反动地主们就乘机在詹学新等人面前大肆造谣污蔑农民运动，恶毒咒骂农会领导人，说什么减租运动侵害了地主的利益等等。

这样一来，詹学新等人就象喝了迷汤一样，初时非但不支持农民的正义斗争，相反却与反动地主勾结在一起，为他们说话。詹学新到潭埗的第二天，便亲自去找徐成章同志质问，指责农会不该减租，侵害地主。徐成章同志当场义正词严地阐明了农民运动的意义，指出减租是广大农民的合理和正义要求。

针对第三师驻广宁部队这种态度，我们乃与周其鉴等同志研究对策，考虑到当前的形势与条件，认为有必要设法对第三师驻广宁部队进行统战工作，争取他们转变，使他们不敢公开站在反动地主一边，从而孤立广宁反动地主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于是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一齐去作第三师驻广宁部队的工作。遇见他们的官兵，就对他们表示欢迎和亲热友好的态度；组织慰劳第三师；向他们进行宣传工作，大量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，使他们不敢公开站在地主一边；还和第三师一道举行“农兵联欢大会”活动等。特别是“农兵联欢大会”开得非常成功。铁甲车队、第三师驻广宁

部队官兵与数千农民一道联欢，我们在会上大力宣传农民兵士是一家、革命的军队应该支持农民解除痛苦的道理。后来第三师驻广宁部队的代表在会上也表示要“实现农兵联合、保国护民之道”。

由于我们统战工作的成功，最后把第三师驻广宁部队争取站到中立地位，不敢代反动地主讲话，也不敢公开阻碍或破坏农民运动的进行，有时还协助我们办一些事情。

3.“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”的组织和斗争

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，大元帅府拍了一个电报来，决定由廖乾五、彭湃、广宁县长蔡鹤朋以及第三师副官长詹学新一共四人组织一个“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”，以负责处理广宁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问题。

我们接到这个电文后，随即送去给广宁县长蔡鹤朋看。蔡鹤朋是个国民党右派，他推说要接到大元帅府打给他的原电后，才开始组织。几天后，原电来了，我们便请他来社岗开会，商量“委员会”的工作开展事宜，但蔡又推说不能离开县属，要我们到县城择地开会。于是我们就带领了铁甲车队去县城开会。

十二月二十六日，“绥缉善后委员会”举行预备会议。我们首先提出了惩办祸首，解除反动地主武装，解决减租，赔偿损失及恢复农会等五项提案。当天散会后，我们随即与周其鉴同志研究，发动农会向“绥缉善后委员会”请愿，详细列举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事实，提出农民的各项要求。第二天，会议继续举行，农会前来递交请愿书，并提出要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。我们立即表示支持，但县长蔡鹤朋不答应，说既然农会要派代表，那么地主方面也应派代表参加。我们坚决反对地主方面也派代表来，双方争持不下，结果当天会议只通过了缉拿祸首江汉英、江淮英、谭侣松等八人的名单以及收缴反动地主武装两项议案，其余问题都没有下文。

会议上虽然通过了收缴反动地主武装，但蔡鹤朋不愿意执行。同时，在这个期间反动地主摧残农会，惨杀农民的事情仍在不断发生。反动地主根本不肯交出武装。

4. “鸿门宴”
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广宁团保总局长谭侣松通过广宁县署送来了一份请帖，邀请铁甲车队的军官和彭湃等同志参加他的宴会（当时我们正来到广宁县城），宴会还请第三师驻广宁部队的军官和县长蔡鹤朋参加。席设团保总局内，时间定下午八时。以谭侣松为首的广宁团保局，是地主利益的捍卫者，一贯骑在农民头上，压榨农民和破坏减租运动，而谭侣松本人正是“绥辑善后委员会”通过的祸首之一。

我们接到请帖后，遂商量对策，考虑去还是不去？如果赴宴的话，敌人就会乘机大造谣言，说铁甲车队同他们在一起喝酒，如何支持他们。这样一来，农民群众便可能会怀疑我们。但如果不赴宴的话，又怕会打草惊蛇，他们因此产生怀疑而警惕起来，甚至逃跑。正商量间，社岗农民送来了一个紧急情报，说谭埠地主武装又杀害了我们四名农民；现在农民人心惶惶，要求铁甲车队赶返社岗，镇定人心。

铁甲车队党小组立即开会，并邀请彭湃同志参加，讨论这一紧急情况。最后决定：将计就计，出席这个宴会，而在席间乘机逮捕谭侣松，以打击广宁反动地主势力，鼓舞农民群众斗志。为了保证这一行动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党小组会还作了周详的部署，决定由廖乾五、徐成章、彭湃三人出席宴会，在席间乘机抓住谭侣松。周士第、赵自选两人则带领铁甲车队去收缴团保总局的反动武装。

下午八时，廖、徐、彭三人如约赴宴了。他们每人身上都带了一支短枪，另带去几名配备短枪的队员去作警卫。周、赵则带了铁

甲车队到达民团驻地，一冲而进，命令他们缴枪；结果一枪不发，就收缴了四十多支枪（后来全部武装了广宁农军）。廖乾五等三人在席间也顺利地逮捕了民团局长谭侣松，并当即将他押回铁甲车队驻地。

事后，县长蔡鹤朋要求我们将谭侣松交给他，说由政府拘押，日后处理。我们当场严词拒绝了，并乘夜押了谭侣松返社岗。

我们此举具有重大意义，既狠狠打击了广宁反动地主的气焰，同时也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县长蔡鹤朋玩弄的阴谋。这个一贯站在地主阶级方面的反动县长，表面上却装得“同情”农民运动的样子；在“绥缉善后委员会”上一面同意通过团保总局长谭侣松为祸首之一，但暗地里又与谭侣松串通一气。这次谭侣松举行的“宴会”，实际上是与蔡鹤朋共同策划出来的。他们想从中搞什么阴谋，但结果却为我们粉碎了。

农民群众对我们逮捕谭侣松此举，都感到无限兴奋，对反抗地主阶级的信心也就更加增强了。他们亲眼看见铁甲车队坚决站在农民阶级一边，帮助农民运动，镇压反动地主，因此对铁甲车队也就更加爱戴了。

5. 攻打江家反动地主大炮楼及与卢振柳的斗争

“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”虽然通过了收缴地主反动武装的议案，但是反动地主并没有因此放下武器。相反，在此期间，广宁各地仍继续不断地发生反动地主破坏农会、杀害农民的事情。反动地主还不断招兵买马，扩大反动武装，要与农民决一死战。

在此情况下，我们非用武力不能达到解除反动地主武装和减租的目的。在逮捕谭侣松当晚，我们派了赵自选乘夜返回广州，向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同志报告，要求加派武力，调运大炮前来攻打江家炮楼，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，遂与廖